

陈
浩◎著

学习周恩来

XUEXI ZHOUENLAI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学习周恩来

陈 浩 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习周恩来/陈浩著.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639 - 1793 - 8

I. 学… II. 陈… III. 周恩来 (1898 ~ 1976) —回忆录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2752 号

学 习 周 恩 来

陈 浩 著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编: 100022 电话: (010) 673923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徐水宏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 × 960mm 16 开本 10.75 印张 168 千字

ISBN 978 - 7 - 5639 - 1793 - 8/B · 47

定价: 15.00 元



周恩来、邓颖超和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前排右二为本书作者陈浩）（1957年10月27日）



周总理和邓颖超欢送总理办公室五位秘书支援文教战线(前排右一陈浩) (1957年10月27日)



在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上 (左四陈浩、左五顾明、左六李琦、左七童小鹏) (1988年)



陈浩与老伴李晨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1998年）



陈浩（左一）在西花厅总理办公室（2006年3月5日）

前 言

我有幸曾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过十来年，深为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公仆、开国总理的崇高精神所感动，所受教育终生难忘。现谨把我多年来回忆、思考所及写出的十几篇文章汇集起来，供读者参阅。

感谢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得这本书能早日出版。

陈 浩

2007 年 9 月 24 日

目 录

学习周恩来	1
一片公心 永鉴青史	19
丹心一片 宏图万卷	32
位尊难移公仆心	50
学习周恩来的精神境界	60
忆周副主席 1946 年几件事	71
润物细无声	79
周恩来与 1946 年国共谈判	86
周恩来创建人民政府的几点指导思想	97
周恩来真正支持妇女解放	109
周恩来鼓励女同志搞外交	122
周恩来与邓颖超为什么能成为革命夫妻的典范	124
夕阳更灿烂	135
海外人士看周恩来	140
深情回忆邓颖超大姐二三事	154

学习周恩来^①

周恩来去世已经有 30 年，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深深地怀念他？我想，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丰功伟绩数不清；第二方面，是他的精神、作风、人格魅力感人至深，感人至久。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曾把周恩来的功绩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民族英雄；二是党的卓越领袖；三是开国元勋；四是人民公仆；五是世界伟人。

当年周恩来的逝世使全世界为之震动。人们说，这一代伟人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是全人类的巨大损失。巴基斯坦的报纸说：“他是屈指可数的可以称为历史创造者的世界人物之一。”喀麦隆电台说：“他是第三世界人民的伟大历史人物。”玻利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说：“世界革命力量失去了一位最杰出的领导人。”就连美国总统尼克松也说：“二十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他感叹说，“历史浅薄的美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人物。”

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周恩来的精神、作风。分四个方面：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忘我无私，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的突出

^① 此文是与老伴李晨合作完成的。李晨曾以此文作为北京市“五老”报告团讲稿。

特点。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第一，是周恩来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

周恩来从1927年就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成员，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自觉地退居助手地位，从此他一直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他不只一次地说：“我只能做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周恩来是甘愿当“第二提琴手”的。

周恩来一向谦虚，他从不突出自己，也不让别人宣扬他。在重庆时，他坚决不让我们的党报——《新华日报》登他的照片，他出国时，发现驻外使馆挂有他的像，就让把他的像取下来，只挂毛主席的像。他一再坚决不许把他在延安、淮安等地的旧居辟为他的纪念馆。正像前法国总统德斯坦所说，他是一个“从不希望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

师哲讲过这样一段故事：在延安时，有一次在窑洞里闲谈。一位同志说，他仔细研究过骆驼的性格和本领，它的特点是：顽强、坚韧、抗寒、抗病、忍饥耐渴、吃苦耐劳，又有强大的负重力，能长途跋涉，过沙漠，穿戈壁，抵御狂风暴雨，团结拒敌，直到胜利。接着还念了几句赞美骆驼的诗句，然后说：“恩来同志，你就是我们党内和革命队伍里的骆驼。”周恩来马上回答说：“不，不，我只是一头小毛驴。”

他为人民服务确实是做到了毛主席所说的“对工作极端的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

他从开国就担任总理，就管理着我们这个几亿人口大国的方方面面：经济、政法、科教、文卫、统战、民族、国防、外交等等，单是经济建设又包括工、农、商、运输、服务等许多方面，其中工业又分成轻重工业等许多部门，农业又分成农、林、水等许多部门。方方面面都涉及千千万万人民的切身利益，都倾注着他大量的心血。

在这方方面面的工作中，他说过，他特别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导弹、卫星）”。

水利部长钱正英在 1988 年纪念周恩来诞辰 90 周年时著文《跟随周总理治水》，文中说，中国的大江大河几乎没有一条是周总理没去过的。他在任的 27 年中，亲自领导我们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方案都是他主持审定的。现在我们的主要江河已经初步建成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两亿多亩发展到七亿亩，水力发电从解放初的 16.3 万千瓦发展到 2 700 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 9 万多马力发展到 8 000 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周总理领导下人民政府确实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中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周恩来是我国发展国防尖端武器、研制“两弹一星”的总指挥。20 世纪 60 年代初帝国主义国家依仗手里掌握的核武器推行核讹诈政策。面对这种核讹诈，中央决定要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由周恩来负责组织专门委员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当时，陈毅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还不太硬，你们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我的腰杆就硬了。”这个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在各部门、各地区大力协同下，集中和调度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组织了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落实大量科研课题和新材料、新设备的成套研制任务。结果在短短两年时间，只用了几十亿元人民币（美国用了几百亿美元），就于 1964 年 10 月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又制成了氢弹，并且与我们自己研制成功的运载工具——导弹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核武器系统。

1965 年又开始试制人造卫星，经过全国大协作，第一颗人造卫星于 1970 年 4 月升空入轨。这就为后来神舟号飞船打下了基础。

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尖端工业，在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霸权主义卡我们的情况下，没有被窒息瘫痪，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严重破坏下，没有被中断，反而能够独立自主地继续发展，

并为大规模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周恩来高超的组织能力和一丝不苟的作风的结果。正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我国在发展国防尖端科学和改进常规武器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保障了建国后几次卫国的局部战争的胜利，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三年困难时期，最突出的表现是粮食问题。当时有一股“浮夸风”。1959年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高达1万亿斤，实际只有3300多亿斤，虚报了三分之二。这种高估产造成了高征购，结果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所购的过头粮甚至包括农民一部分口粮和种子，于是1960年全国普遍因营养不足发生浮肿病，有些地方还饿死了人。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粮食库存也很紧张：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面对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周恩来忧心如焚，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不得不亲自指挥调运粮食，每周几次约粮食部门的人谈话（据统计，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两年4个月共谈话115次）。还亲自同产粮区各省的领导同志直接通话，要他们顾全大局，支持国家统一调拨粮食。到1960年底，灾情日益严重，粮食收支逆差不断扩大，单靠省与省之间的粮食调拨已经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了。中央根据周恩来和陈云的建议，从1961到1965年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直接供应沿海京、津、沪等几大城市和辽宁省，这样既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又可以减少从产粮区调运粮食，缓解运输的紧张状况。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才渡过了难关。

周恩来夜以继日、争分夺秒的工作是尽人皆知的。仅举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回忆他常说的一些话就令人十分感动：

“争取一分钟时间，就多做一分钟工作。”

“有急事，随时叫醒我。”

“无数革命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牺牲了，我们有幸活到今天，应该把这些同志的担子挑起来，多作工作，这样才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啊！”

“我老了，为人民服务的时间不多了，要抢时间工作才行啊！”

“我们要像蚕一样将最后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

他在患癌症不得不住进医院后，仍坚持工作。病危时，还约人谈对台工作。

他在弥留之际，对医务人员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快去照顾别人吧，他们那里更需要你。”日本朋友冈崎嘉平太听到这事，深为感动地说：“周总理是一个真正的人，直到死他都在为别人着想。”

周恩来对人民的极端热忱，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几乎能使我们每个人都亲身感受到。他特别重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把它作为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反复强调。他一再讲“要永远不与群众隔离”。他关心人的面很广，从工农群众到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从党内同志到党外朋友，直到获释战犯。他对人总是发自内心的关切，凡是与人民群众疾苦相关的事无不牵动他的心。

妇科专家林巧稚说：“我过去信上帝，不过是追求一种精神寄托，追求一种高尚的做人准则。上帝是什么样的，我没见过，谁都没见过，可是我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一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多少年来就是他这种崇高的精神在影响着我，使我由信上帝变成信共产党。要说真有上帝，他就是我心中的上帝。”

“末代皇帝”溥仪被特赦后，周恩来接见了，亲自考虑他的工作安排，鼓励他继续学习改造，关心他的婚姻生活，还看了他写的《我的前半生》，对他说：“你写的东西有价值，它是旧社会的一面镜子，旧社会结束了，你也能变成为新人。后代人看了你这本书会说：皇帝也被共产党改造好了。”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艰苦奋斗的精神

周恩来艰苦奋斗的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时期：领导长征；坚持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文革”中苦撑危局。

1. 领导长征

周恩来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聂荣臻说：“碰到了困难人们就想起长征，想起长征就感到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当年红军长征是在失去了根据地依托，强敌围追堵截、不断轰炸的严重情况下进行的。他们终日在荒山峻岭及江河大川跋涉，不仅物质补给极为困难，且逢雪山草地这样的艰险，再加上党内斗争的尖锐和复杂，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领导下，红军终于克服重重险阻，经过 11 个省、367 天，从江西瑞金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从开始的 8 万多人，历经战斗牺牲，最后只剩下 6 000 多人。周恩来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树身和树根。”这些经过千锤百炼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极可宝贵的精华，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

周恩来生前特别喜欢《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中的《过雪山草地》。这首歌唱的是长征中最艰险的一段路程，当年有许多红军战士在这里倒下牺牲。听到这首歌曲，仿佛又把他带回那种艰难困苦的岁月，成为鼓舞他坚持工作、忘却劳累和癌症病痛的巨大力量。

2. 坚持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

从 1936 年西安事变到 1946 年全国内战爆发，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常驻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蒋介石打了 10 年的交道，同时还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工作，做上层统战工作。

先说西安事变。这次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抗日救国而发动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联合一切抗日爱国力量，组织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蒋介石的政策也已从“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在方针上我们和张、杨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当时面对的情况非常复杂：南京政府各派系和各地方军阀的态度以及国

际上各种力量的动向都随时在变化。西安的局面十分混乱。面对这种形势，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托进入西安，一去就置身于当时那个政治风暴的中心。他在瞬息万变的惊险环境里，临危不惧，坚定沉着，机智勇敢，忘我拼搏，力挽狂澜，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正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再以抗战时期三次反共高潮中最险恶的皖南事变为例。当时国共两党关系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中央非常担心处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周恩来和南方局同志的安全，两次急电周恩来，要求迅速撤退干部，特别要求恩来、剑英、必武、颖超“于最短期间离渝”。周恩来当即召集南方局会议，经过分析，认为虽然形势险恶，但时局的发展仍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二是国民党还不敢贸然全面反共，仍维持国共合作局面。当此时机，还要争取第二种可能。如果马上全部撤走，我们将失去政治上进一步进攻的阵地，于我方不利。会议决定：叶剑英率一部分人撤回延安，周恩来则说“我要坚持到最后”，与董必武、邓颖超留在重庆。

为了坚守阵地，他召集南方局工作人员开会说：“我们对全面分裂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突然袭击，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如果我们被抓起来，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他就是这样始终屹立在斗争的第一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从容机智地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态，巧妙有力地击退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地进攻，挽救了危局，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

1946年5月，由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也到了南京，住在梅园新村。这个地方不到100米就有十几个特务据点，还化装成鞋匠、小商贩、三轮车夫，日夜进行监视，正如郭沫若所说：“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6月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爆发了全面内战。这时破裂已成定局，斗争更加复杂。国民党在谈判中时而施加高压，时而用美言引诱，力图使我们犯错误，以便把破裂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

上。周恩来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表现出大智大勇，坚定而沉着地一次又一次用事实来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10月国民党攻占张家口，下令召开伪国大，这样就向全国人民充分暴露了是国民党要破裂，要打内战，从而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3. “文革”期间苦撑危局^①

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

现在的青年朋友已经很难想象“文化大革命”时的情景，甚至认为有些事情是荒唐而不可思议的，有人也许会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周恩来要执行那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等等。^②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用这样的观点来看，许多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一直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在党内享有极高的权威。他对自己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决不让步和妥协，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实现它。对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也好，其他领导人也好，在当时情况下都难以反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是酿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面对当时那种复杂错综的形势，周恩来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拍案而起，公开反对“文革”，那只能意味着同毛泽东决裂，然后“靠边站”，被打倒。另一种，只能表示支持“文革”，有时还得说一些违心的话，办一些违心的事，利用他身为党中央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和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利用他的威信，勉力工作，尽力减少损失。^③

周恩来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毅然决然

^① 参看李琦的《回忆与思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和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② 详见《回忆与思考》第165、166页。

^③ 详见《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一书的序。

地选择了第二条路，忍辱负重，呕心沥血，极力挽救危局。

（1）尽力维系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当时，各条战线的工作几乎都不能正常运转了。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铁路交通时常中断，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他心急如焚地对经委的同志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他反击林彪、江青一伙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在他奋力拼搏地抢救下，才使得已经极度恶化的国民经济免于崩溃，使全国人民的吃、穿、用得到基本保证。

与此同时，他还根据国际关系的新变化（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正常化），抓住时机，及时提出“扩大出口，换取外汇，引进技术，推进‘四化’”。制定“四三引进方案”，用43亿美元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其中有大化肥设备、大化纤设备、石油化工设备、大电站、武钢的1.7米轧机、综合采煤机组等等，这不仅是“一五”计划期间大规模引进156项之后第二批大规模引进，而且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长期封锁禁运的局面，是贸易和经济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这个“四三引进方案”的实施不仅增强了我国基础工业的力量，增加了新的工业门类，提高了现代化技术水平，填补了一些缺门产品，而且培养了一批掌握现代化先进技术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

（2）尽量减少损失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对社会各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他们打着“破四旧”^①的旗号，走上街头，扫荡所谓“封、资、修”的各种名称字号，倡议把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道，同仁医院改名为工农兵医院，并且要砸烂“全聚德”招牌，捣毁“荣宝斋”“黑店”，还到处毁坏名胜古迹，查抄社会名人的住宅、财物，又打着揪斗“走资派”的旗号，批斗学校的校长和教师，

^① 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